

評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 劉紀暉

書名：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The May Fourth Era

作者：Lin Yu-sheng (林毓生)

出版：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Wisconsin, 1979.

頁數：Xiv + 201, 包括書目、字彙、索引。

對三十年代以後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反傳統幾乎是當然，甚至是應然而必要的。也許正是這種視為當然的風氣或心態，使學術界對現代中國的反傳統思想，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與研究。事實上，從二十年代以降的幾次學術界大論爭，如「東西文化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本位文化論爭」與「中西文化論戰」等，基本上都與反傳統思想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反傳統思想或心態，對現代中國史的發展具有決定性而深遠的影響。可惜，直到最近仍不見有討論現代中國反傳統思想的專著出現，因此，林氏此書是值得歡迎的。

林氏在導論中首即指出，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其特質吾人可以「整體性」(totalistic)一辭加以描述。此種思想特質，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是獨一無二的特殊現象，值得吾人特加注意與研究。而此種反傳統的整體論之所以形成，林氏認為主要乃是這些反傳統人物的思想模式使然。因此本書所討論的重點或強調的主題，並不在五四時代反傳統思想的內容，而是在論證反傳統思想的整體性特質，以及此整體論思想模式的形成與影響。

林氏認為五四反傳統主義的整體論本質，不能以心理學、政治學或社會學的律則來解釋，而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問題，必須從二十世紀中國繁複而辯證之思想的與社會的變遷與持續之脈絡中加以探討。林氏首先提出中國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的崩潰與整體性反傳統主義興起的關係。林氏認為中國的普遍王權具有宗教宇宙論的基礎，而使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形

評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

成一整合體。辛亥革命之後，清朝——中國最後一個普遍王權崩潰，原來整合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道德秩序亦因而崩解。如此，提供給五四時代反傳統論者利用得自傳統的思想模式為武器，而整體性地攻擊中國傳統之「結構的可能性」(structural possibility)。林氏自承此種說法是一種理想型(ideal-type)的邏輯推論，雖具有邏輯的清晰性，却只是近似而非忠實反映實際的歷史情況。(頁一八，註一九)然而此種說法的最大問題，亦即在此種邏輯上的理想型究竟與運作上的歷史事實符合到何種程度？此則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林氏接著指出，民初袁世凱政權之腐敗，與洪憲帝制對傳統符號的濫用，以及張勳復辟與保皇黨的活動，使知識分子證實或體驗了傳統惡習之強大勢力，而有思想與文化改革的要求，因此產生反傳統的思想革命。然而五四時代的反傳統思想却具有少見的整體論特質——即認為傳統是一有機的實體，只有整體地消除傳統，才能有效地建立新的現代文化。其原因，林氏認為主要乃由於五四時代的人物皆具有相同的「預設的思想模式」(a presupposed mode of thinking)。此思想模式即林氏所謂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即「在趨近解決社會政治變遷之問題時，強調思想與文化變遷的必然優先性之一種基設」。此種「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現代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如嚴復、康有為、譚嗣同與梁啟超等人身上都表現得很清楚，而一致強調政治社會的變遷需要有基於新世界觀的思想文化基礎，新觀念新思想是變革的基本根源。此法亦表現在第二代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與魯迅等身上。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思想模式。

林氏指出，有點反諷的是，形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却是來自傳統儒家一元論主知主義的思想模式(a monistic and 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林氏認為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中極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強調人類意識的功能，亦即人心之內在道德與/或理知經驗之功能。在檢視了孟荀與程朱陸王諸儒對「心」的道德與理知本能的觀點後，林氏認為儒家特殊的思想模式是：「一種一元論主知主義的思想模式，亦即為了謀求解決道德上與政治上的問題，特別強調基本思想或觀念所具有的力量與優先性，無論這種基本思想或觀念是如何界定與獲得。」亦即強調：「『心』的理知本能為掌握基本觀念的手段，與此種基本觀念掌握之後所能產生的解決道德與政治問題的功能。」(註)此種一元論主知主義可能發展成一種主知的整體論之思想模式(an intellectualistic-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以為傳統

中國社會與文化是一個有機的實體（an organismic entity），其形式與本質是由一些基本觀念所決定。而普遍王權崩解後的各種政治、社會、文化力量，正是將五四時代的反傳統主義者得自傳統的一元思想模式，推向整體性的分析範疇而形成反傳統的整體論。以爲欲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使其生存於物競天擇的現代環境裏，就必須從基本觀念或思想改造起，而且必須是有機地整體地改造，此即五四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特質。本書即以陳獨秀、胡適與魯迅三人爲代表人物，反覆討論、驗證此特質。林氏指出五四反傳統主義者接受傳統儒家主義的觀點，而形成「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因而有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出現，這是很見地而深具洞察力的論點，亦是林氏的一大發現。林氏可謂獨運匠心，另闢蹊徑。不過林氏以其所謂的「人爲構成說」（anthropogenic constructivism）——相信世界上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秩序都是遠古聖君與聖人所有意創建的——解釋主知主義之所以成爲儒家思想模式的分析終點，則並不十分妥貼。事實上，「人爲構成說」是主知主義的結果而非原因。因爲聖人只不過是一個先知，超乎聖人之上尚有陰、陽、理、氣、心、性等更本體性的「道」存在，而爲聖人致知之對象。假如「人爲構成說」成立的話，則宋明儒家即不必強調「格物」的基本工夫之重要性。主知主義之所以成爲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家——思想模式的分析終點，主要是因儒家將正確或有效的行爲還原爲本體性的理、氣之運作，因此格物致知的窮理工夫即成爲正確行動的先決與必要條件。亦即正確的思想與認知，是正確行動的先決必要條件。儒家思想模式的基本預設，是認定在終極分析上，思想或認知對行爲的優先性以及思想與行爲的一致性。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即對此預設作了最有力的說明。對王陽明而言，在終極的分析上，即知即行，知與行之間並無一隙間隔存在。此即儒家主知主義之所以形成的最主要因素。

本書後半分別討論了陳獨秀、胡適與魯迅三人的整體性反傳統思想的特質與複雜性。林氏認爲陳獨秀的思想動力，主要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主義。由於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信仰，與帝國主義壓迫下所激發的民族主義精神，使陳獨秀主張解放個人潛能的個人主義，從而抨擊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對個人的壓抑。因此，陳獨秀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表達一種民族主義的反傳統論，這是很奇特的現象。而袁世凱的帝制、張勳復辟以及康有爲等人的孔教運動，使陳獨秀認知傳統力量之大，因此形成整體地反對儒家思想的主張。此種整體論的思想模式，使其相信中國儒家式傳統均是源自孔子思想的有機性的衍生物，因此須進一步反對傳統全體。陳獨秀此種對儒家傳統整體性本質的概念，使儒家思想的改革變爲不可能。因爲照此概念，儒家思想與新信仰

、新社會與新國家是不可並存的，故只有革命——完全而整體地拋棄傳統——才是唯一的選擇。而革命之道，最有效最基本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是政治社會變遷的先決條件。於此，吾人清楚地看出傳統「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對陳獨秀思想模式的深刻影響。

關於胡適的反傳統思想，林氏認為要把握其不易捉摸的特質，最好的方法是，分析胡適終其一生從未清楚自覺的基本矛盾：即一方面獻身於對傳統作漸進的改革，一方面却又對傳統做整體性的拒斥。胡適這種矛盾事實上只是形式的或邏輯的，胡適的改革主義吾人不能以其表面形式而接受，而必須視之為一種偽改革主義（*Pseudo reformism*）來了解，因它是完成整體西化的手段或工具，其本身並非目的。至若胡適偽改革主義與全盤西化觀念的形成，其原因主要是杜威的影響。

在接受杜威的實驗主義之前，胡適對儒家並不抱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持改革主義的觀點。然而先存於胡適心中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却決定了胡適採取杜威思想或學說之方式與重點。胡適以為中國問題之解決，首先即須輸入杜威式的科學方法，以便中國人能掌握產生「創造性才智」之鑰，這是中國現代化要成功的先決條件。於是胡適乃汲汲於尋求移植杜威式的科學方法到中國文化之道，欲以漸進的改革主義手段，實現激進的西化——杜威化——目的。為使中國有機地接受杜威式的科學文化，胡適乃於傳統哲學尤其是墨家與名家思想中，尋找與杜威式的科學觀念相容或相似的科學方法，而強調科學的精神與探討是中國傳統的特色之一。然而林氏認為：「胡適的科學改革主義，主要是使中國全盤杜威化的工具，而不是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尋找中國文化的認同。」因此這種對中國傳統中具有科學理性成分存在的認定，只能作為其漸進西化論的媒介，而無法修正其整體性反傳統的觀點。林氏認為胡適的改革主義並未抑止他的整體性反傳統之衝動。「胡適深受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影響，以致形成主知主義的整體觀之思想模式，使他歸根究底仍認為中國傳統的罪孽是由於傳統中國人心靈的卑劣所造成的。」此種一元論整體觀的論點，使胡適認為，攻擊中國傳統，如果要有有效的話，就必須是整體性的。

關於魯迅的複雜意識及其反傳統思想，林氏認為可從三個層次加以分析，即：顯示的意識層次、隱示的意識層次與下意識層次。在論辯的意識層次上，林氏深具洞察力地指出，魯迅在「吶喊」自序內所說明的促其棄醫學文的原因——觀賞一部日俄戰爭的影片，並非其決心從事文學活動的決定性因素，而毋寧是觸媒，觸發其原本潛藏內心深處的動機。此更深層的動機，是從早年

即開始的對中國民性的探索。魯迅早年即認為中國民性的最大缺失是缺乏真誠與愛心，亦即偽善、無恥且多疑。在仙台習醫，尤其是看到上述日俄戰爭之影片，又喚起魯迅轉化中國民性的想法，以為改變中國人的精神，才是「第一要著」。此種對個性或個人主義精神以及國民性的強調，可由其留日時期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一文充分顯示出來。魯迅此種民性決定論的形成，顯然是受「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影響。

魯迅的反傳統思想導源於其對中國民性與傳統社會禮教的憎惡，以為中國民性詐偽、奴性、愚昧、偽善、自欺而無恥，而中國之所以形成此種民性，乃因「吃人的禮教」使然。魯迅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即對傳統「吃人的禮教」作整體性的攻擊。「狂人日記」控訴了整個中國的傳統歷史，然而魯迅並不探索中國吃人禮教的政治社會因素，却強烈暗示了「觀念」的決定性角色。魯迅認為是昏亂的思想使整個中國傳統成為可憎之物，亦塑造了中國人可憎的民性。因此掃除傳統昏亂思想的思想革命是必要的。然而五四時期的魯迅對改造中國民性的可能性，却抱持悲觀的懷疑態度。此乃種因於魯迅對中國民性的特殊觀點，林氏認為魯迅所塑造的小說人物阿Q，正是中國民性的表徵。吾人可從「阿Q正傳」充分認識魯迅的中國民性觀。

林氏認為阿Q的快樂是來自其意識特質與思想模式相互加強的結果。阿Q的意識特質即缺乏內在的自我意識與經驗的論斷能力，而其思想模式則是奇特而鄉愿的「精神優勝法」。因而形成其既可笑又可憐的行為特性。然而，與小說內其他人物相較，阿Q却又有其天真愚直可愛的一面。因此，林氏敏銳地指出，魯迅的意識是辯證的：即當其一面整體性地攻擊傳統，却又委諾於（be committed to）其中的某些價值。然而，林氏進一步指出，對阿Q這種天真面的肯定，却無法認為是從內在產生思想與道德變遷，或接受外在刺激而形成此種變遷的根源。因為阿Q缺乏內在的自我意識，無法從內在培養、發展此善良的一面；由於缺乏經驗的論斷能力，故外在刺激亦無法引發有效的行動。林氏認為阿Q的特質亦正顯示出魯迅的兩難困境（dilemma）：即雖然相信思想革命是改造中國的先決條件，然而事實上這思想革命却似乎是不可期的，因為中國人缺乏內在的自我意識與經驗的論斷能力。

林氏接著指出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反諷現象，即他雖是主張整體性地拒斥傳統的先驅者，却花許多時間在傳統文學、雕刻與石碑等事物的研究上。尤其是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魯迅可謂開路先鋒。在其所著「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稱道「金瓶梅」與「

儒林外史」具有實在論人道主義的精神。林氏問道：這些研究活動對魯迅反傳統整體論是具有消蝕作用？亦或只是形式上的矛盾而無實質影響？林氏認為這種現象只是形式上的矛盾，在魯迅的意識層次並不構成嚴重的緊張（tension）。因為就魯迅看來，中國傳統小說的積極價值面，是全人類所有文學普遍適用的，並非中國所特有，故對中國傳統文化並無積極的影響，亦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價值。魯迅終其一生從未真正面對此一邏輯上的謬誤（fallacy），因為對魯迅而言，這只是形式上的矛盾，對其整體性的反傳統論並無實質的挑戰性。

林氏認為對魯迅整體性反傳統論構成實質挑戰的是：魯迅在隱示的意識層次上對某些傳統價值在思想與道德上的委諾（commitment）。魯迅對反傳統整體論與某些傳統價值的同時委諾，在其意識裏引起強烈的緊張。林氏敏銳而技巧地討論了魯迅一篇題為「在酒樓上」的敘事小說，認為魯迅在此篇小說內借呂緯甫之口表達了對中國傳統「念舊」的道德價值之委諾。魯迅此種「念舊」情懷，反映了隱示但自覺的採取傳統文化的規範與對傳統價值的思想及道德上的委諾，因而在其意識裏引起真正的思想緊張。此種思想緊張本可促其對中國傳統作轉化性的解釋（a transformative interpretation），或者最低限度亦可促其懷疑整體性拒斥傳統的有效性。然而魯迅却無法超越此思想緊張，而達成如上的轉變。最主要的原因，林氏認為是受其反傳統的整體論之支配使然。因為在其「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影響下——因而形成整體論的思想模式——魯迅無法朝更有活力而多元的方式解決其思想上的緊張。因此，魯迅的意識危機也就一直懸而未決。

林氏此書是近年來少見的結構嚴謹而論理緊密的不可多得之作。其主要貢獻有三：一、指出五四時代激烈反傳統思想的整體論特質，頗見其慧眼。二、提出傳統儒家「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之思想模式，並指出此思想模式與五四反傳統主義整體論之關係，於此可見林氏洞察力之敏銳。對整個中國思想史之研究，可能因此而另闢一新途徑。三、對陳獨秀尤其是胡適與魯迅思想意識之精闢分析，使吾人對此三人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註 此段譯文採自林氏所著，劉錚雲等譯，而經林氏親自訂正的「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一文，收入周陽山等編，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八年初版），頁三三七—八。